
抗战时期教会高校的迁变

余子侠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的高教事业遭受到严重摧残,教会高校亦未因其为“教会”主办的身份而幸免。在战争重创之下,教会高校或远迁内地以图生存,或立足原地力谋发展,为着中华民族教育现代化事业不致中辍,广大师生员工精诚团结、顽强奋斗,使得教会学校在艰难的处境中,进一步向着中国化、世俗化的方向转型和演变。

—

自本世纪 20 年代后期开始,教会高校大多向中国政府注册立案,以“私立”的名义在中国社会中稳定下来,并逐步发展。然而,正当它们扩充冀宇,有所进展之时,卢沟桥枪声却打断了它们亟图发展的进程。随着时局恶化,这些中国特殊的私立高校,同国人自立的所有高校一样,也不得不作出以内迁为主要方式的种种应变。据统计,除天主教所设的震旦大学、辅仁大学和天津工商学院三校,因其差会所在国的国际关系未作搬迁外,新教(基督教)各差会所开设或支助的各高校,只有原本在战时后方的华西协合大学和仅在上海市区内稍作搬迁的圣约翰大学是例外,其余教会高校与国内其他所有高校一样,要么远迁内地以避烽火,要么受敌蹂躏以致

消亡。^① 与其他学校不同的,只是教会高校的特殊身份决定了它们的迁徙应变又有自身的特点。

其一,迁变准备更为不足。战争爆发后,教会高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存在一种“侥幸”心理。正是这一点,使得不少教会高校增受了一些或可避免的残害和损失。

在内迁的教会高校中,金陵大学算是启程较早的高校之一。它在七七事变后仅4个月就动身西迁入川,但这也是企图借“教会大学”的特殊身份躲避战火而未成后的不得已之举。据当事人所言,直到金大作出迁往四川寄寓华西协合大学的决定后,还有一部分人对局势估计不足,认为“一旦南京失守,有美国大使馆保护,不

① 其余教会各高校内迁情形,根据有关史料整理如次:金陵大学,1937年11月24日开始西迁,1928年3月1日在蓉开学,理学院部分迁重庆,1946年4月放假后陆续返宁。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937年8月下旬拟分迁上海、武昌、成都三处,武昌、上海两部亦分别于1938年1月和暑期入川,1946年4月16日开始复员。福建协和大学,1938年5月奉令迁闽北邵武,1945年11月筹备复员,1946年5月1日宣告复课。华南女子文理学院,1938年5月迁闽西南平,1946年3月在福州原址复学。华中大学,1938年7月10日开始迁往桂林,1939年2月4日转而迁往大理,1946年4月分批迁返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1938年7月陆续迁达重庆曾家岩,1940年5月因重庆校舍被炸毁而转往江北廖家花园,1947年春复员。齐鲁大学,济南沦陷后一度停办,多数师生随迁成都并于1938年9月复课,1946年10月四川部分全部复员完毕。湘雅医学院,1938年9月迁往贵筑,1944年12月7日开始迁重庆,1946年5月迁返长沙。之江文理学院,1937年秋避难安徽屯溪,次年1月移沪复课,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沪校停办,旋设办事处于金华,随即急迁邵武,1943年迁设工学院于贵筑,复于1944年夏迁重庆,1945年与东吴、沪江合组东吴沪江之江法商工学院,为夜大学,1946年春沪校(三、四年级)暂行恢复,渝校迁返杭州。东吴大学,8.13后文理学院迁吴兴,未几转迁长沙及黟县,1938年初在沪复课,与圣约翰、之江等合作,1941年冬因日军陷沪而停办,商学院部分迁重庆,留沪部分以“沪江书院”名义续办,1946年4月重庆部分迁返上海原址。岭南大学,1938年10月18日退出广州,11月14日在港复课,农学院二、三、四年级另在九龙新界实习,医学院五、六年级在曲江、上海医学院等处实习,1941年底因香港沦陷而迁曲江,医、农两学院分在韶关、乐昌等地上课,1945年春再迁梅县,1945年秋返广州原址。燕京大学,1941年12月部分师生迁川,1942年10月在蓉正式上课,1945年10月10日留平员生复校,1946年夏成都部分迁返。北平协和医学院,1942年1月底被迫停办,极少量师生赴川,高级护校亦迁往华西协大,1946年5月迁返北平。

怕日本人干扰”。^①加之当时教育部也认为,公立大学已内迁,教会大学不迁也无所谓。直至南京告急,局势恶化,部令突然下达闭校停课,金大才匆忙准备,仓促启程。师生500余人分3批出发,备尝艰辛,历时3月才疲惫地赶赴成都。比较金大而言,那些动身较迟的教会高校,更因持其出身犹豫拖延而备受艰辛。如武昌华中大学,在战事已过半年之后,还有不少人“不愿意想到卢沟桥的枪声已是一种残酷的宣战”,坚持在原址维持正常教学秩序。直到1938年暑期过后,面对日寇在其占领区域残忍行径的严酷现实,尤其“日本军队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毫无怜爱之心”,才被迫选择唯一的出路而“举校西迁”。^②由于事先对内迁工作准备不足,该校在西迁第一站桂林落脚不及半年,又作出西往云南大理喜洲的再迁之举。就这样,华大师生在八千余里的长途跋涉中,颠沛流离地度过了近一年的实实在在的“流亡大学”生活。

在如何应变迁徙问题上,比较上述事例,有些教会高校对其差会所在国的“国际影响”的迷信程度更为深重。位居长沙的湘雅医学院,当长沙局势险峻,院方讨论是否西迁之际,雅礼会一些教授认为,即使长沙沦落敌手,美国方面可以出面交涉,保护院校的安全。为了避免其时日机的轰袭,他们主张在学校屋顶上漆上美国国旗,日机就不敢贸然落弹。只是在院长张孝骞等人的坚持下,该校才开始西迁。无独有偶,设在杭州的之江文理学院和设在福州的华南女子文理学院,都曾以美国国旗为幌子,以避免日机的轰炸。尤其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直到抗战中期日机袭扰福州时,在校舍屋顶上还用硼漆涂刷出一幅很大的美国国旗,企求以此避免弹火,而未积极地及时将校中珍贵图书文籍和仪器标本搬迁外地。然而,这种“拉大旗作虎皮”的保护措施,并未阻止住福州第二次沦陷时日军

① 陈裕光:《回忆金陵大学》,载《金陵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纪念册》,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0页。

② 韦卓民:《三年来的中国战时教育》(*Three Years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War time*),现藏华中师大档案馆。

对该校的大肆破坏,致使“华南所遗留在榕城的物产,可谓是一扫平地荡然无存”。^①

当然,教会高校的特殊身份,在战争前期的一个时期内,在某些地方也起过一些“保护”作用。如在华北北平的两所教会学校——燕京大学和北平协和医学院,即在这种“保护”之下,惴惴不安地度过了抗战前半期的艰难岁月。然而,当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两所教会高校却遭到了内迁教会学校未曾有过的厄运:前者被日军强行霸占后改作军官疗养院,包括校长司徒雷登在内的中外籍师生员工30多人遭到拘押,该校被遣散的人员只得背井离乡辗转西迁;后者在日军占领后则完全停办,仅有极少量的师生逃离魔掌进入了当时的大后方。由此可见,作为中国高教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教会高校的特殊身份,并不能阻止日军的摧残。

其二,择所寄居较为便利。在应变内迁的过程中,教会高校也曾因其特殊身份得到过有关教会组织或人员的援助。故比较其他高校尤其是国人私立院校,在内迁后的择所寄居方面占有某些便利之处。

教会高校的应变迁徙得到教会组织或人员的助力,首先表现在某些组织或人员对有关教会高校迁变并转方面的组织和联系。早在1936年,经过中国各基督教教会大学托事部代表的磋商,“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United Board of Christia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in China)成立,并制定出了“中国基督教大学调整规划”。其时即拟将东华地区的圣约翰、东吴、之江、沪江、金大、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6所教会高校合并改组为“华东大学”。抗战初期,该组织为实现组成“华东大学”的目标,曾组织帮助上述各校向上海搬迁,并使圣约翰、东吴、之江、沪江等校有过短时间的松散

^① 《华南学院校刊》第38期,1945年12月1日。

合作。^① 其后,有一些东部教会高校西迁过程中,该组织又促成齐鲁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以及后来的燕京大学,以成都华西协合大学为寓所,较顺利地解决了这些西迁高校寄居借读的迫切问题。

教会高校的应变迁徙得到助力,也体现在教会组织或人员助其解决实际困难。如华中大学长途八千里的西迁行动,就得到过地方教会组织的助力。在第一次西迁时,该校在桂林地方教会的热心相助下,很快地安顿好了师生员工及一些教师家属的住所,还租借到教学场所。第二次西迁喜洲,则因当时在香港的云南地区所属大教区的主教愿意提供赞助而顺利成行,后来又在大理地区的教会帮助下,及时地安顿好自己的“新居”。内迁的教会高校,几乎都有相同的经历。华南女子文理学院于1938年5月内迁本省南平后,即是“假教会所办的剑津中学为校址”^②;福州协和学院于1938年5月迁至闽北邵武,其校舍“系借用美部会设立之汉美乐德两中学、男女道学校、新旧医院、幼稚园及各西教士住宅等新式楼屋共十八座”^③。未曾西迁的教会高校,也曾借教会之助及时安身。如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三年多时间一直“足不出沪”的东吴法学院,即一直借用位于上海公共租界内美国监理公会的慕尔堂作校舍。甚至当战争结束后,有些教会高校迁返原址,因校舍设备受敌寇严重破坏无法复课时,也得到过教会组织的及时相帮。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于1947年春自重庆复员武昌后,就曾得到圣公会的帮

① 尽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东吴大学和之江大学等校留沪师生一度组织过“华东大学”,但“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部”原意组织的“华东基督教大学”一直未得实现。过去有些文章对此有所不察,现仅借当事人之口以明示其时真相:“七七抗战之前,美国教会一度设想调整在华的教会大学,考虑到把江浙两省的教会大学圣约翰、东吴、之江、沪江、金大、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六校合并成为一所‘华东大学’。尽管‘酝酿、研究了很长时间,也开过不少次会’,但‘因抗战爆发,不了了之’(陈裕光《回忆金陵大学》,同前)。

② 郭肇民:《私立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历史概述》,《福建文史资料》第23辑,第103页。

③ 林景润:《抗战以来的福建协和学院》,《教育杂志》第31卷第1号(1941年1月)。

助,借文华中学二部校舍以解燃眉。

教会高校的应变迁徙,还得到教会组织或人员的资助经费。如湘雅医学院作出搬迁决定后,为解决交通运输的困难,罗氏基金会于其搬迁之际捐助了3000美元(相当于18000元法币),为其支付了部分运输费用。该校后来在贵阳复课,又得到过雅礼会的部分经济援助。1940年8月1日该校奉部令改为国立后,仍不时得到雅礼会的经费援助。至于西迁成都华西坝一地的5所教会高校,在恢复和开办经费上,得到了中国基督教大学联董会较多的资金投入,使它们在战争时期不仅得以维持,学科建设也有所发展和完善。战争结束后教会高校东返时,中国基督教大学联董会和中国教会大学协会,又为它们的行蹒和恢复,扩大了拨款的数量。

值得指出的是,抗战时期教会大学在迁变过程中,也受过某些教会组织或人员的伤害。岭南大学即是其一。当广州沦陷岭南大学计划搬迁时,美国基金委员会硬性将校产收回,而不主张更不帮助该校作战时迁徙,企图使其停办以待战后。该校领导人为了延续学校的生存,不得不借力于香港大学的赞助而迁港复课。香港沦陷后,该校计划复校于韶关,又因美基会的缘故险被CC派首脑陈立夫强行改组。^①由此可见,抗战期间对于已被中国政府接受立案的教会高校,教会组织和传教士所在国的某些组织态度并不完全一致,其中确有消极者。

二

抗战时期教会高校为着中国高教事业的进步作出的第一步贡献,在于它们于迁徙之际尽快恢复自身的教学秩序,以培养民族圣战事业所亟需的知识人才。

战争全面爆发后,教会高校大致可分为三类,即留待原地顽强

^① 参见杨逸梅:《李应林时期的岭南大学》,《广东文史资料》第51辑。

支撑,远迁内地以图生存,以及受敌蹂躏后个别高校的被迫停顿。为了中国高教事业不致因战事而中辍,在克服万苦千难以求秩序的正常恢复和事业的连续进展这一点上,为各校共通之处。如岭南大学,为了保证高教人才在战争时期的持续培养,仅就抗战初期该校迁港后复课安排来看,可说是费尽了心机。迁港之后,即1938年11月起,该校文、理工两学院各年级及农学院一年级、医学院一至三年级学生,安排在借用的香港大学校舍上课。农学院的二至四年级为便于实习,另在新界租地办理。其中三、四年级自1940年度,又迁往粤北乐昌坪石上课。医学院的四年级,商及港大后随同港大医科四年级生,一起在玛丽医院上课;五、六年级的学生,一部分由医学院院长率领在曲江复课、实习,一部分则在国立上海医学院借读实习。自1939年度,四、五年级学生在港与港大医科一起上课,六年级学生则分别派往曲江或贵阳实习。由此不难想见,该校为寻找教学场所,几乎到了见缝插针的地步。

比较就近迁徙的岭南大学,那些远迁西部的教会高校,为迅即恢复正常教学秩序须作出更大努力。如由湖北武昌转迁至云南喜洲的华中大学,西迁可谓旷日经年、行程八千,但是它始终坚持了正常的教学秩序。第一次西迁桂林,该校师生人随马到就忙于开课。转迁喜洲后,虽经长途奔波劳累,但仍然很快就开始了自己新的学期。正如该校校长韦卓民所叙,“计阅一年举校播迁者再,长征八千里,而总计学生缺课不满六周,占全学年五分之一,员生坚(艰)苦至可钦佩也”。^①又如由华中迁往西南的湘雅医学院,搬迁后恢复正常教学秩序所间歇的时日更为短暂。该校首迁由长沙至贵阳,搬迁日程主要安排在1938年的暑假,次由贵阳迁重庆,又安排在1944年的寒假。故此该校虽经两次搬迁,但基本维持了正常的开课时间,尤其首迁贵阳时,“仅比正常开学时间推迟了3

① 韦卓民:《华中大学史略》,载《私立武昌华中大学二十周年纪念特刊》(铅印稿)。

周”。^① 不仅如此, 搬迁后的湘雅, 除了 3 名人员休假外, 教师队伍基本完整, 而且经过 1400 余公里的行程后, 整个图书设备几乎全部安全到达迁居地。

为了向民族圣战事业提供合格的高教人才, 使学生掌握好较系统较完整的专业知识, 即使是那些深受敌寇践踏后被迫停顿的教会高校, 也在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恢复自己的教学秩序, 让正在就读的学生完成自己的学业。如设在华北的北平协和医学院, 在日寇占领校园后于 1942 年 1 月底被迫停办。其时在该校附设高级护校的校长聂毓禅女士认识到, “当务之急是如何安排学生”。^② 于是, 她以非凡的才干, 很快就与北平、天津、唐山甚至上海一些医疗机构接上联系, 对留校学生进行了紧张而有秩序的安顿: 一年级学生由本校教师在校外继续上课, 实习则借助北平一些医院或护校的接应; 二年级学生的部分课程和教学实习, 则利用当时尚未被日军占用的该校第一卫生所等医疗单位来完成; 对已完成全部课程的三年级学生, 则安排他们前往几所条件较好的医院去完成各自的实习任务。作此安排后, 聂女士又于次年春离开沦陷区, 经过两个月的艰辛跋涉, 前往成都组织复校, 尽力使因战乱而流离的学生不致失学, 为抗战事业培养亟需的医护人才。

抗战时期教会高校为中国高教事业的进步作出的第二步贡献, 乃在于他们在抗战期间的继续发展, 使中国高教事业现代化进程不致因残酷战争而停滞不前。

抗战期间, 绝大多数教会高校, 无论内迁、未迁者, 均借战事间隙和迁后定居等各种机会, 千方百计求得自身不同程度的发展。其中最为突出的成就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各校在校学生人数的增长, 一是各校教、研机构的添设。

① 张孝骞:《国立湘雅医学院》,《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 26 辑。

② 聂毓禅:《协和医学院护士学校的变迁》,《话说老协和》,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99 页。

从在校学生人数的增长来看,抗战期间教会高校学生人数均有不同程度的添加。在未作转移的教会高校中,以华西协合大学为例。因身处战时大后方,故此在抗战期间的第一个学期里,华西协大便接收了30多所大学105名借读生、10多名转学生和续招新生40名,全校学生由战前335人增至618人。自此以后,历年在校生总数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至1945年春季已达1300人,比战前增至3倍多。故而就其成长历程而言,抗战时期可谓该校“大发展时期”。^①另如天主教教会设于北平的辅仁大学,因其驻华代表和校务长均为德国人的缘故,能在原址一直维持至抗战胜利,其间虽受日伪迫害,但在校人数同样呈现较大幅度的增长。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乃在于该校“是当时国民政府承认的在沦陷区唯一一所大学”;“很多青年激于爱国思想,不甘于去读日伪控制的大学,又一时不能离开沦陷区”,是故“纷纷投考辅仁大学”。^②

在已作迁徙的教会高校中,以金陵大学为例。金大是教会高校中西迁较早的高校之一,迁蓉之际“共有学生387人,教职员145人”,入川后至当年秋,“学生即增至506人,教职员147人”。至1940年秋,又发展至“注册学生786人,教职员262人”,比迁川之时扩增2倍以上。^③除金陵大学外,其他各内迁的教会高校,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调整,在知识人才的培养规模方面,都有相当程度的发展。限于篇幅,现仅以“表一”显示其时各校发展情景之大致:

① 华西校史编委会:《华西医科大学》第三章:抗日时期的大发展,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62—109页。

② 《北京师范大学校史》附录:辅仁大学简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40—241页。

③ 金石:《抗战以来的金陵大学》,《教育杂志》第31卷第1号(1941年1月)。

表一 内迁教会各高校在校生增添情况抽样^①

学校名称	初迁时学生人数	定居后学生人数
齐鲁大学	1938年9月复课时160人	1940年度达308人 ^②
福建协和学院	1938年夏迁邵时145名	1942年度达400余人
湘雅医学院	1938年10月抵筑时120名	1940年8月达256名 ^③
华中大学	1938年8月抵桂时130名	1944年秋季达216名
金陵大学	1938年2月抵蓉时387名	1940年秋达786名
岭南大学	1938年11月在港复课550名	1940年上学期606名 ^④
燕京大学	1942年抵蓉后200余人	在川第一学期结束时364人
金陵女子文理	1938年初在川时50余人	1944年秋达320名
之江文理学院	1938年初在沪复课470余	1941年夏开课时1000余人
东吴大学法学院	1942年入川时近100人	1942年入川后400余人 ^⑤

从各校教、研机构的添设来看,除成立于抗战初期的震旦女子文理学院7个系属于完全新设之数外,其它教会各高校亦有不同额数的增添。即使其时规模最小、在校生员始终不足百数的文华图

① 主要资料来源:《教育杂志》第31卷第1号(1941年1月),《全国高等教育概况》(台北《革命文献》第56辑),《抗战时期之高等教育》(台北《革命文献》第60辑),《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五编(高等教育编),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贵阳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抗日战争时期的贵州院校》(《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以及全国政协及各地政协所编文史资料有关文章、有关高校校史和华中师大档案馆藏有关校史资料等。除表中10所高校外,其它内迁各高校有沪江大学、文华图专、华南女子文理及东吴大学文理学院,因资料不全,无法抽样列入,有待来者。但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五编有关条目,知华南女子文理学院“迁南平后”,“学生人数激增”。

② 另有华侨学生补习班20余人,研究生15人。

③ 另在沅陵的部分学生60名。

④ 1938年11月在港复课的550人中,有相当一部分系转学学生;1940年上学期606人,不包括农学院三、四年级在坪石上课的30余人。

⑤ 入川后另有研究生10余人,同时在沪就读的法律、会计两系有生计300余人。

书馆学专科学校,在战争期间西迁重庆以后,也于1940年秋“为适应社会需要,配合政府提高行政效率起见,特呈准教育部添设档案管理科”。^①至于其他一些规模较大、历史较久的教会高校,在战争期间或添加院、系、部、所,以此扩大规模,或增设短训性质的专修科、班,以应战事亟需。其中扩展步伐较大者如金陵大学,几乎在抗战期间的每个学年度都有新的系、所产生。^②其间值得一提的,一是前述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乃创立于抗战爆发之后,可说是教会高教事业“整体发展”中一明显部分;二是福建协和学院,正是因在迁移邵武后有所发展,而于1942年4月奉部令升格改称为大学。

抗战时期教会高校为中国高教事业的进步作出的第三步贡献,乃在于高校内迁者对迁居地区教育事业的推进,以利新式教育在中国一些边远地区的起步和平衡发展。

抗战期间内迁的教会各高校所及地区,绝大多数为贫瘠边远之地。这些地区的教育落后,人才稀缺。因此,教会高校的内迁,同其他学校内迁一样,从其客观社会效果来看,实际上是对这些后进地区进行着一场文明开发运动,促进了所迁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进步和发展,有利于中国教育现代化事业进程趋向平衡。内迁教会高校的主要迁流地区在中国的西部。不包括西藏、宁夏在内的陕、甘、新、川、康、滇、贵、黔、桂以及青海和湘西等西部地区,抗战之前总计大专以上学校不过10所左右,而且其学术水准普遍偏低。高

①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五编：高等教育篇”，“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

② 1938年秋创设影音(电化教育)专修科;1939年春开办园艺职业师资科,汽车专修科,并设社会服务部;1940年春增设图书馆专修科,同年农科研究所增设农艺学部,秋增添电焊职业训练班,电机工程班(后于1943年扩充为电机工程学系),设社会福利部及社会福利行政研究部,又文学院合并哲学、心理、教育等系有关课程设哲学心理系;1941年初代办农贷人员训练班,增设园艺学部;1943年增办园艺专修科,添设植物病虫害系;1945年又于文科研究所内增设社会学部,招收社会福利行政研究生;此外于1942年与华西协合大学、金女大、齐鲁大学合办二年制英语专修科。另,抗战期间于文科加设史学研究所,于理科加设化学研究所,于农科加设农业经济研究所、园艺研究所等。

校内迁之后,仅教会高校就使这一地区骤然增加高教机构 10 所,其中成都华西坝,即菌集着学术水准较高的燕京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华西协合大学 5 所教会高校及北平协和医学院的一部分。除高等教育外,教会高校的内迁,对所迁地区的中等教育、初等教育、学前教育等在内的各层次教育,以及社会教育、女子教育、通俗教育等在内的各类型教育,都有不同程度的推动和促进。现择取 3 所有代表性的教会高校对迁居地区各种教育事业之贡献以示一斑。

华中大学的迁避地滇西小镇大理喜洲,人称“连上帝也怕落脚的地方”。华大驻足其地,可谓中国地处最为边远的大学了。就在这种几乎从未接受过现代文明浸染的地区,华大一蹲即是 7 年。在这 7 年间,华大一改过去在武昌时期的办学方向,大量招收和培养了西部地区的莘莘学子,仅云南籍学生就有 300 余人。如果加上来自其它诸如贵州、广西、湘西等西部省区的学生人数,毫无疑问,这 7 年间华大可谓一所真正的西部地区的大专院校了。与之同时,华大为西部地区输送了大量的知识人才。直至今日,“仅以昆明为例,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云南民族学院、云南林学院、云南工学院、省中医学院,都有华中大学毕业或曾在华中大学读书的同学”,“另外,还有一大批同学任教于省内各专州、县的中学、中专及大专学校”。^①此外,华大西迁对所迁地区的中小学教育事业的进步,同样发挥了重大的促进作用。当华大迁往喜洲时,当地一些头面人物正在筹备建立该地区第一所新式中学——五台学校。华大教育学院的师生下车伊始即予其援手,为该中学的创办做了大量的工作,并以此作为教育学院学生的实习学校,有些学生毕业后还加入了这所中学的师资队伍。有了自己的第一所新式中学,喜洲地方的新式小学教育也接踵发展起来了。此后,该地区教育现代化事业得到

^① 转见余子侠:《华中大学西迁述论》,《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

了真正的发动。在滇期间, 华大师生还组织了民众服务团, 利用课余, 对迁居地区的文化事业和社会教育事业, 也作了积极有力的推动。

福建协和大学迁居的邵武, 位于闽西北武夷山之东南侧、富屯溪之上游, 地处闽、浙、赣三省交界处, 于福建省乃一边远贫瘠地区。在协大迁入之前, 其他新式教育事业亦处后进地位。协大迁邵后, 先后开办有高级农业职业学校一所; 汉美小学一所; 国民学校一所, 发展了当地的学校教育。从社会教育的进步看, 该校居邵期间辟有社会教育推行试验区, 其工作项目分生产、卫生、游艺、学校等 4 种。其中民众学校分妇女、成人、儿童等班, 每日派有员生前往工作; 同时于前述国民学校内, 设有妇女班、成人班等, 教学设计和实施, 皆由协大学生执行。两校每日出席受教者各有数十人和上百数十人。此外, 还设有各种学生实习机关, 有机地将学校教学与实际社会事业结合, 有效地促进了地方民众科学知识的进步和文化水准的提高。

专门从事女子高等教育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在迁居成都之后, 不仅自身事业日有发展, 而且对四川省地方教育事业亦有不少贡献。仅就该校在川期间开办的乡村服务处来看, 就使仁寿、华阳两县先后受益。金女大的乡村服务处起先筹设于仁寿, 一方面作为本校学生的实习场所, 一方面用以组织和训练乡村妇女, 提高她们的知识水平和增强她们的生产技能。1943 年 3 月, 乡村服务处又转设于华阳。除了前在仁寿从事的种种事业外, 金女大还在此处举办了专门培养地方保育人才的练习班和专门从事女子教育的妇女班等。在这期间, 金女大还先后兴办过儿童福利实验所、暑假儿童学校、名为“小乐园”的学校托儿所和乡村实验托儿所等。由此可见, 金女大在川时于地方教育事业的推进方面, 主要体现在女子教育和学前教育两个方面。当该校返迁南京时, 还将儿童福利实验所的一切玩具、教具、用具及档案资料、实习记录等, 全部留交给华西协合大学, 以使相关事业得以继续发展。

综上所述,在抗日战争期间,教会高校为民族圣战事业最后胜利做出贡献,并推动了中国教育现代化事业的持续进步。同时教会高教事业也在战争时期发生整体变化,即进一步朝着中国化和世俗化方向转型和发展。

表二 华中大学西迁后学生成份变化^①

学期	学生总数	成份		出身	
		基督徒	非基督徒	教会中学	非教会中学
1939 年春	108	67	41	88	20
1939 年秋	163	90	73	125	38
1940 年春	90	63	27	78	12
1940 年秋	88	56	32	64	24
1941 年春	98	55	43	63	35
1941 年秋	149	68	81	69	80
1942 年春	131	64	67	64	67
1942 年秋	152	61	91	45	107
1943 年春	128	56	72	44	84
1943 年秋	150	42	108	24	126
1944 年春	134	36	98	21	113
1944 年秋	216	54	162	40	176
1945 年春	171	48	123	39	132
1945 年秋	286	84	202	43	243

① 资料来源:华中师范大学档案馆藏:“私立武昌华中大学校史档案材料”有关抗战时期各卷册“学生名单表”。

抗战时期教会高教事业朝向中国化和世俗化而转型和发展,还表现在这种教育事业所承负的社会责任上面。其中尤以变更人才培养、推动科研事业,投入社会服务这几个方面的贡献最为明显。

首先,在人才培养方面,由于形势和环境的改变,绝大多数教会高校将以往那种造就肩负“上帝”使命的神职人员的办学宗旨,进一步转换为完成培养肩负民族使命的知识人才的现实任务。

教会高校在人才培养方向方面的变化,主要表现在教育对象的改变。尽管教会高校早在抗战之前招生方向就有所更改,即基督徒学生与非基督徒学生的比例、来自教会中学的学生与非教会中学学生的比例已经发生变化。但就其学生整体而言,与宗教事业相关的成份一直占压倒的优势。即使抗战初期,这种优势仍然存在。然而至抗战中后期,除极个别的学校外,绝大多数教会高校培养对象的天平,均以较大比例的幅度向世俗社会倾斜。现仅就华中大学西迁后的情况为例列表说明这种变化(见上页“表二”)。

由于教会大学与教会中学有一种特殊的挂钩关系^①,故此华中大学西迁以后,其附中及与其有师生互递关系的教会中学也随同迁徙。不仅如此,该校在滇期间,广州协和神学院等宗教教育机构也迁往大理等地,这些都为西迁后的华大招收信仰宗教的学生

① 教会高教事业自从在中国社会自成体系以来,一直保持着一种与国人自办学校别异的传统,这就是绝大多数教会高校都有自己的生源基地,或设立有自己的附属教会中学,或与一些教会中学保持着一种特殊的紧密联系:一是这些中学与自己挂钩的高校同属于一个或几个差会所办;二是这些高校与中学之间所造就的毕业生有一种互进的关系,在上者的毕业生为在下者的主要师资来源,在下者的毕业生为在上者的主要新生进款。正因有此关系,抗战爆发后,当教会高校纷纷内迁之时,所属教会中学亦相继接踵迁徙,而且这种教会中学随同教会高校迁变的行动,几乎处于一种同步状态。

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但由上表可知,自1941年秋季开始,被认为一直保持“大部分学生是基督徒或在基督学校受到训练”这一“传统”的华中大学,其在校学生,基督徒和来自教会中学的学生,也由过去在百分比中占有多数转为少数了。至1942年秋,则这种比例的变化更以非基督徒和非教会中学出身的学生占绝对压倒的优势。

在人才培养对象上,华中大学的变化代表着一种趋势、一种倾向。如此变易同样发生在其他教会高校中:如金陵大学,在1930—1935年的5年间,信奉基督教的学生常在140—170人之间,占全校学生总数的1/3,其中正式受过洗礼的基督徒学生,在101—143人之间,然而迁川以后的数年间,尽管该校“宗教成绩可佳”,而学生中受洗的基督徒不过38名之数。^①又如在本省境内迁徙的岭南大学,不仅其间同学中对基督教“虔诚笃信者不多”,而且迁往坪石一带后,连往常的宗教生活也处于一种近乎瘫痪的状态,既“无圣餐之设”,又“无主日崇拜”。^②再如抗战期间一直“足不出沪”,且一直拖延不向中国政府注册的圣约翰大学,尽管该校宗教气氛一贯浓厚,但有关统计材料表明,该校基督徒占全体学生数之比例,30年代前为1/3,30年代中后期包括抗战初期,已降至1/4,而经过抗战期间的变动,至1946年初占全体学生数仅及1/5。可见抗战期间的教会在人才培养方面,有一种普遍性变化,这就是“天国”的利益让位于民族的利益。

教会高校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变化,还表现在女生人数的不断扩增。教会高校在女子教育方面一直居国人自立高校之先。抗战时期,随着整个高教事业中女生数的普遍增长^③,教会各高校又有

① 参见何一波:《金陵大学的宗教活动》,《江苏文史资料》第38辑。

② 叶惠恒:《坪石小忆》,《韶关文史资料》第13辑。

③ 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14编“教育统计”第1413页所列,1936—1945年间全国在校女大学生数分别为:6375人、5352人、6648人、7834人、10200人、11774人、12273人、13701人、14843人、15861人。1945年比1936年增长近2.5倍,而同期在校男生仅增长1.9倍。

更大的进步。这种进步的表现之一,是过去曾招收过女生的教会高校,抗战期间在校女生无论是人数递增名额还是在学生总数中所占比例,都有相当幅度的增长。据《教育杂志》第31卷第1号所载,1934年时女生占全校学生比例分别为29.2%和22.8%的华西协和大学和岭南大学,至1941年初已分别上升为“占三分之一以上”和“约占四分之一强”。再据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的研究,1941年时,“燕京的学生中几乎三分之一是女生”,而于抗战前一年才开女禁且仅招7名女生的圣约翰大学,到1941年时女生亦占全校学生总数1200人的1/3。

辅仁大学在教会高校中是开放女禁最晚的三所学校之一,然而在抗战期间,为了适当满足沦陷区女青年就学的要求,该校于1938年9月开放女禁,招收文、教两院各系及理学院数学系数学组一年级女生,同年还于东安门北河沿增办女附中分院。翌年9月,辅仁又于理学院物理、化学各系一年级招收女生,并添设有专招女生的家政系。1940年9月,又添招生物系女生。至此,该校各院、系均为女性青年提供了求学深造的条件。至于华南女子文理和金陵女子文理两所专收女生的教会学院,其学生人数在抗战期间的增添,前文早有说明。

教会高校女子教育的进步,还表现为专授女生的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开设。该校1937—1938年度仅有19名学生注册入学,一年后即1938—1939年度招生人数就增至80人,后来每年都有适当的扩增,故此在抗战后添加到400人之数。尽管该校的学生走出校门后就业人数不多,但就教会高教事业所扩及的社会层面而言,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认识教会高教事业人才培养的变化,还要分析和了解此类高校课堂教学内容及课外宗教活动的情形。对此,卢茨女士的《中国教会大学史》已有所探讨和论述。现仅引章开沅教授的结论来说明当时的情况:到1937—1945年间,“一方面,专业教育、学术水准与社会工作迅速提升;而另一方面,校园内的宗教教育与宗教生活则

逐渐下降。选读宗教课程与参加课外宗教活动的学生愈来愈少,而到 40 年代政治气氛更弥漫于学校各个角落。团契如雨后春笋,但大多已失去原有的宗教性质,甚至连宗教色彩也消失殆尽”。在一般的学生的心目中,那些传教士教育者们,“与一般非教徒教授之间没有什么差别”,学生们尊重这些人,“那是由于尊重他们的学识渊博、诲人不倦,并不是感染于他对基督教的无私奉献”。^①

其次,在科研事业方面,在既往的基础上,教会高校更加注意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国情的研究,尤其结合抗战事业的需要,开设了不少有利于民族进步和抗战胜利的科研项目,并且均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就。

抗战期间教会高校的科研事业结合现时社会需要,主要内容大致可划分为两大类:一是经济方面为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一是生活方面为了医药卫生事业的改进。

在促进工农业生产发展方面,绝大多数教会高校都从事过有关项目的研究。如迁往滇西的华中大学,就组织过对苍山十八溪水电动力的试验研究,对滇西酒精、皮革、油脂工业的专题研究,以及对洱海各水层的氧含量 PH 值、水生物及浮游生物的分析研究等。再如金陵大学在川期间,仅农学院的研究工作就计达百余种,其中最著成效者包括:四川土地分类等农业经济方面的研究;水稻、小麦、棉花、大豆、高粱、玉米、粟作,土壤细菌、作物施肥,以及农具改进与制造等农艺方面的研究;黄果选种,柑桔、苹果、梨等结实与储藏,番茄、甘蓝、洋葱等育种,以及干果、干菜制作等园艺方面的研究;植物病害、昆虫标本等生物方面的研究;以及桐、胡麻、五倍子及其他药用植物等经济植物方面的研究。研究成果的应用和推广,有益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改进医药卫生方面,尤以那些医学院校和设有医、药学系甚

^① 章开沅:《中国教会大学的历史命运——以贝德士文献为实证》,“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武汉,1995年10月。

至化学、生物学系的高校成就为最。如湘雅医学院的师生,在繁重的教学任务之外,还坚持对贵阳地区的斑疹、伤寒、疟疾、阿米巴痢疾等地方病进行广泛的调查和研究,取得不少有意义的科研成果。再如华西协合大学,除作西医、西药方面的研究外,还对中药学进行了调查和研究。诸如中药材产地的调查,土产药材的成份分析,以及中药有效成份的鉴定、分析与提炼等,有力地促进了传统医药学研究的科学化和推广了中草药的临床应用。研究成果用于实践,不仅有益于社会整体健康水平的提高,同时也间接地促进了战时后方的经济生产。

抗战时期教会高校的科研事业结合国情和走向世俗社会,还表现在对中国社会的研究。这方面研究的主要内容也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一是对中国国情民情的研究,尤其是边地社会的研究。

早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大多数教会高校就开始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其目的主要在于寻求与中国社会相契合之处,以利自身在中国社会中的生存和发展。抗战期间,除此目的外,更主要是借以提高国人的民族自强精神,增强国人战胜暴日的民族自信心。因此,抗战期间许多教会高校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人们常言的‘国学’研究十分重视。如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为该校最高研究机关,自1939年度顾颉刚先生去以后,一方面增添人员、增购图书,另一方面添招研究生,出版《国学季刊》,发表科研成果。再如金陵大学、华西协大等,都成立了自己的中国文化研究所。金大的中国文化研究所,以甲骨文、殷契佚存、吉金图录、历代画目以及四川碑碣等研究为其所长。协大的中国文化研究所,其成就更包括宗教、考古、史学、美术、人类学和语言学等各个领域。其时该所出版的《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论丛》和《华西大学文化研究所集刊》,在国内外备受称誉,被认为是中国同类刊物中之最杰出者。

又如辅仁大学,是当时国民政府承认的在沦陷区唯一一所大学,故此抗战爆发后,原在各大学任教的教师中不少知名教授纷纷

转入是校任职，一时间群星璀璨、人才荟萃，故对传统文化的研究称誉一时。遑论其时该校发表的学术论文、主办的学术刊物和出版的学术专著，即使该校有关专业毕业生的毕业论文，也绝大多数以国学为其研究对象。据有关研究者统计，该校抗战期间国文、历史、哲学三系历届毕业生的国学毕业论文数与毕业生总数，不算缺佚的1944年，总计分别为262篇和280人^①，即毕业生选取国学作论文题目者，占毕业论文总数的93%左右。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热潮，不仅推动了学术进步，更使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光大弘扬。

在加强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探讨和研究的同时，其时教会高校还十分注重对边地社会尤其少数民族社会的调查研究。如两度转迁的华中大学，在迁桂期间就着手研究了广西境内苗、瑶等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和风物习俗，迁滇以后，对西南地区各民族的研究更加全面和系统。其时该校的边疆文化研究定于三个领域：一是有关西南地区各民族的文献研究，包括历史学、地理学、民族学、文化学等；二是有关西南民族社会生活的调查研究，包括宗教信仰、衣食住行、娱乐婚丧，以及其它方面的风俗习性等；三是有关西南民族的语言研究，包括发音、语法及其语言表达方式等。一些教会高校还组织成立了边疆研究所，如华西协和大学的边疆研究所即成立于1942年。该所与成立于1941年的中国边疆学会一道，对边地社会作出了大量的调查研究，而在中国西部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以及社会环境等方面的研究最著成效。与此同时，该校还多次通过公开演讲、文物展览和刊物出版等形式，将瑶、羌、藏等少数民族的状况介绍给外界社会，开启了时人了解西部的窗牖，对这些后进地区的开发和建设，无疑产生了积极影响。

再次，教会高校适于时代的需要，不少师生纷纷走出校门，直接投入社会服务，以实际行动为社会各项事业的进步和民族战争

^① 参见何建明：《辅仁大学之国学与陈垣》，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武汉，1995年10月。